

主 编 李公昭
副主编 姚学勇

博士论丛

BOSHI LUNCONG

ZC414 JX

19/2001

军事谊文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博士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博士论丛

第 3 卷

主 编 李公昭
副主编 姚学勇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士论丛/李公昭编.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150-150-0

I. 博... II. 李...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908 号

书 名: 博 士 论 丛

主 编: 李公昭 副主编: 姚学勇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发行

(邮编 100011)

印刷者: 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1.4375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0150-150-0/G·36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1996年1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在洛阳成立。这是一个在学院领导下的跨系、跨专业由博士组成的群众性学术组织。

几年来,博士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定期组织学术报告,交流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国内外语言文化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努力掌握国内外语言文化研究的前沿动态;定期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邀请他们参加中心组织的学术活动;与在国内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志建立并保持联系,开展学术、资料、信息等方面的交流等。起到了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促进教学科研工作作用。

撰写语言文化研究论文,编写论文专集是研究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军事谊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9年出版了《语言文化研究的新视角》,2000年出版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语言与文化》,今年编辑出版时,我们定名为《博士论丛》第3卷,作为前两部论文集的延续而结集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博士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2001年12月于洛阳

目 录

关于语言国情学.....	(1)
丁尼生论稿	(24)
顺应新世纪的挑战,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	(68)
俄语学者对功能语言学的贡献	(78)
“JIMC + IT” 定价结构中修饰语的句法语义功能	(104)
学科交叉性与语言学空间的确立	(117)
M. B. ЛОМОХОВ 的语言研究及其语言学思想	(126)
语言共性研究综观	(139)
俄语句子意义的层次分析	(158)
记忆与外语教学和学习	(176)
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188)
论 A 冠 A 原则	(200)
《山地语言》中的女英雄	(212)
欧洲话语分析面面观	(227)
中日連体修飾節被修飾成分の主題化について	(235)
高依赖度日语名句型同语反复的语义解释与语境的关系	(243)
漫话韩国汉字	(256)
论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形成	(274)
孙子军事情报思想体系论析	(318)
论两种国家主权观的形成	(331)
历史上的军事革命与军事扩张	(351)

关于语言国情学

吴国华 彭文钊

一、语言国情学诞生的背景

自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奠定了结构主义理论开始,语言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个稳定的结构系统进行研究,用一套精确的术语来分析和描述语言,以揭示语言内部的本质和规律,为语言学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语言学摆脱了结构主义的束缚,不再满足对作为一个封闭静态的语言结构系统的分析和描写,转而重视研究“语境中的语言”和“运用中的语言”。语言学研究总体上由语言转向言语、由形式转向意义(知识)、从结构转向功能、从描写转向阐释(认知)。语言国情学正是在这一宏观理论背景下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的。在微观研究方面,语言国情学的核心其实是语义问题。近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语义学实际上已经从意义过渡到知识的研究(Караулов, 1988)。语言国情学正是把语义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研究的代表性学科之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词语、句子或语篇中的民族文化语义(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①。

“语言国情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和学科名称确定下来经

① 1966年由Н. Г. Комлев首次作为术语正式提出。见《О 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мпоненте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фил. 1966. No. 5)。

历了一个过程。这与 E. M. Верецагин、B.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积极倡导一个新的教学方法论，并由此推动创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有直接关系。早在 1969 年，Верецагин 在《国情学在对外俄语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Роль и место в практик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一文中就使用了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国情学）这一现成术语阐述其在教授俄语过程中注意结合国情教育的观点。两年之后的 1971 年，在他与 Костомаров 合著的《国情学在教授外国人俄语中的语言学问题》（《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ностранцам》）一文中首次出现了“语言国情学教学法”（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методика）这一术语，意指“教授与掌握（所学语言）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教学过程”（1971：10）。这一思想在语言国情学的两部权威著作《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M.，1973，1976，1983，1990）和《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M.，1980）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此以后，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作为学科名称和术语得以明确化、规范化，并被收入 1990 年版的《苏联百科辞典》。

综观整个 80 年代，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一术语的使用基本上有两大趋势：一是从与语言、言语、交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任意现象中抽取文化信息的任何分析都可以解释为“语言国情学式”的；二是把文化因素纳入语言教学过程中的任何实践。这一术语使用的混乱现象在 1987 年敖得萨第三次语言国情学国际研讨会上达到了顶点。从大会发言的题目即可见一斑：如“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语言国情能力）”，“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语言国情注释）”，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 (具有语言国情价值的事物)”,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语言国情练习)”,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对比语言国情学)”,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ценность (语言国情价值)”,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语言国情信息)”等等^①。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1991),特别是第四次语言国情学国际研讨会(1994,莫斯科)之后,先后出现了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ведение (语言文化学),形成了与原有术语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并存的局面。但在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会刊《国外俄语》和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常常使用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一术语(吴国华,1999)。

由于语言国情学在建立初期不过是教学法的一个方向,只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才逐步形成一个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因为它和语言学、国情学、文化学的密切关系,所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建议将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译为文化背景学、文化语言学、国情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语言国俗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学科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了一种复杂的性质。学科名称和术语的更替昭示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同时也是一个学科澄清谬误,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下面,我们将较为详细地介绍俄罗斯国内语言国情学建立20多年来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基本状况。

二、词汇背景理论

Верец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认为任何语言的词语中都携带有一定的民族文化成素。他们将带有民族文化义素的词分为三类:不对应词(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背景词(фоновые слова)和伴随意义词(коннотативные слова)。其核心是词汇背景理论

^① 见 Прохоров, 1998: 33。

(теория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фона)。

词汇背景理论认为词由词位 (лексема) 和义位 (семема) 构成, 分别对应的是词的表达平面 (план выражения) 和内容平面 (план содержания)。义位由若干义素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доли - СД) 组成。按照是否参加对事物的分类, 义素又可分为概念义素 (понятийная СД) 和非概念义素 (непонятийная СД)。例如, 通过联想试验我们可以获得俄语词 “белый” (白的) 有关的义素:

- | | | |
|--------|---------------|------------|
| Белый: | 1) цвет снега | 2) бумага |
| | 3) облако | 4) ворона |
| | 5) уголь | 6) мясо |
| | 7) свет | 8) изба... |

其中第 (1) 项参加对词的分类, 明确该颜色为 цвет снега (雪的颜色), 以区别 цвет крови (血的颜色) 等等。其余义素说明非本质、非概念, 但是与该词有关的, 说明该词所指事物性质特点的。据此我们可以判断 (1) 为概念义素, 其余为非概念义素。如果说概念义素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观念,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意义的话, 则非概念义素是人们在运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 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应, 并从广义上显示特定语言社团的社会文化特征 (吴国华, 1996: 3)。根据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的定义, 概念义素与概念相对应, 而非概念义素又称为背景义素 (фоновые СД)。背景义素的总和即为词汇背景。

语言国情学对义素的理解超出了传统语文学对义素的理解, 因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 即使某一语言符号表达的是同一概念, 它的背景义素也可能不尽相同。例如, “学校” 这一概念在英语 school 和俄语 школа 中虽然有一致的概念义素, 但也不

排除彼此对立的非概念义素。如 public school 直译为俄语为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 然而对英国人来说 public school 恰恰不是公共的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而是私立的 (частная) 和付费的 (платная)。这也是语言国情学对语言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依据背景义素的性质, 可将其划分为社会性义素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Д) 和个人性义素 (личные СД)。所谓社会性义素是指某些 СД 在一定的语言社团内享有普遍性和广泛性, 为人所共知。只有社会性义素才有分析的价值。而个人性义素反映了说话人 (作者) 对事物 (现象) 的认识程度, 含有较强的主观因素, 往往因人而异, 故不属于语言国情学的研究范畴。确定社会性义素的主要标准, 就是看其转义、文化感情色彩、象征意义等有无一定的社会性, 是不是大众的、普遍的。虽然词的非概念义素是通过联想试验等手段获得的, 联想也有强烈的个人性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 但为了使研究更具客观性, 我们在采集资料时应当把重点放在那些具有相对普遍性的义素上。例如, 我们在对 сова (猫头鹰) 一词进行联想调查时发现, 约有 60% 的受试者 (俄罗斯人) 提到了 ум (智慧) 的概念, 所以尽管辞典中无此义项, 我们还是把它作为 сова 的一个社会性义素。而有些个人性义素, 尽管有些是名家用法, 但未得到公认, 也不应列为分析对象。(吴国华, 1999)

依据社会性义素的所属关系及普及范围, 又可将其分为民族文化义素 (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Д) 和跨语言义素 (межъязыковые СД)。前者指该语言所特有的义素, 也只有在该语言社团内才能被人们接受。跨语言义素是指语言间通用的、一致的义素, 如 белая бумага (白纸) 等。此外, 跨语言义素依据流传范围的广狭还可分为全人类义素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СД) 和区域性义素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Д)。顾名思义, 前者可为全人类所共

有,而后者只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中通用,如 белая ночь (白夜) 只在高纬度地区民族的语言中才是现实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揭示词语中民族文化义素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区域性义素。因为从对比语言国情学的角度看,某些区域性义素同样具有民族文化特点(吴国华,1997)。

我们知道,词的义素可通过操母语者的联想试验获得。研究表明,从某一义素与其所属词语的内外关系看,还可将背景义素分为普通义素(экзотерические СД)和异常义素(эзотерические СД)。那些不专属于某一特定词的义素,对该词而言是外部背景义素(внешние СД),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称之为普通义素;而那些只为某词语所特有的义素是内部背景义素(внутренние СД),称为异常义素。例如,скатерть(桌布)是 стол(桌子)的一个异常义素,因为它同 кровать(床)和 стул(椅子)都没有关系:例如 С. И. Ожегов 词典对 скатерть(桌布)的释义为:“изделие из плотной ткани, которым покрывают стол”(铺在桌面上的纺织制品)。由于普通义素的外部特性,它可以是宽泛的和变动不定的,因此无法穷尽列举和形成一个封闭的、最终的集合(Верещ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1980: 122)。与此相反,异常义素因其数量有限,可以一一列举。应当指出的是,语言国情学关心的不是那些各级语言单位包含的人类共有知识,而是那些集中反映民族文化和历史特点的信息。所以异常义素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得到了教学法家的高度重视。其中就包含为大家所熟知的文化伴随意义(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①。

众所周知,语言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进化演变。实践证明,与概念义素相比,背景义素的变化要更活跃一些,而前者具

^① 详见吴国华《文化词汇学》,1996。

有相对稳定性。因此,从义位发展变化的角度还可将背景义素分为共时义素(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ие СД)和历时义素(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ие СД)。作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贯彻词汇背景语义化的另一条根本原则——历史性原则(Верец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1980: 95)。就是说,在对词汇进行语言国情学分析时,必须从词汇背景的历时性出发,不仅要揭示现实的、人所共知的共时义素,同时也应注意到那些还没有彻底消亡的历时义素,因为“词汇背景中的历时义素绝不是残余的和机械过时了的,而是同共时义素一样具有现实性”,“如果说词的共时义素根据授课目的或研究要求列出的话,那么历时义素则按其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同上, 1980: 96)。如: четверть (四分之一桶) 是 молоко (牛奶) 的历时义素, 而 пакет (纸袋) 和 бутылка (瓶子) 则是它的共时义素。

三、语言国情学作为教学法分支的理论与实践

应当说,语言国情学最初是为了适应交际与文化因素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作为语言教学论(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а)的一个独立分支创立的(Прохоров, 1998)。前苏联的对外俄语教学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今天已经体系完备、蔚为大观。为了贯彻“以俄语为中介并在其学习过程中”掌握文化这一方法论原则,语言国情学一直注重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由于对学科本身性质存在不同理解,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与问题。对语言国情学教学法理论作一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发展脉络,明辨其理论走向和成因。

语言国情学在创建初期首先在理论上划清了与国情学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的界线。^①“语言国情学”最初特指“揭示语言(言语)单位蕴含的民族文化成分”这一基本方法论原则。除此之外,在1976年版的《语言与文化》中还探讨了背景知识问题,词的民族文化成素问题,并引入了义素概念。而文化因素在语言单位中的积蓄与表达、揭示方法和分类描写问题在1980年版《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周到的阐述。其核心便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词汇背景理论。词在这里被视为“知识的容载”(вместилище знаний)(1980: 192-193)。

应当承认,1976年版《语言与文化》和1980年版《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语言国情学的发展线索。词的背景理论的提出丰富了人们对词义结构的认识,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教学法实践研究的发展。事实上,专著《词的语言国情学理论》走的正是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路子:一方面它提出建立语言国情词汇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核心为词汇背景理论,可视为对语言学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它还提出了语言国情辞典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明确了编纂语言国情学辞典的指导思想,可视为词汇背景理论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冠以“语言国情学辞典”的系列辞书,如《苏联国民教育》(《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 М., 1978),《俄语谚语、俗语和成语》(《Русск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поговорки и крылат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М., 1978),及其它有类似目的地名、姓氏、文学艺术词汇辞典等等。1977-1982年是语言国情学辞典编纂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Прохоров, 1998)。

^① 关于对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的不同理解及由此产生的三个研究方向,见 Прохоров, 1998: 8-12。

随着语言国情学教学法思想在辞典学领域的进一步贯彻,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研究者发现,在词义注释过程中只对语言单位蕴含的民族文化成素进行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入某些具有百科知识性质的内容。这必然会动摇语言国情学的理论基础,重新走回到国情学知识灌输的老路上去,最终只能落得个水是水、油是油的结果,因为“所得到的素材无法有机地融合到语言教学过程中去”(Прохоров, 1998: 15)。^①这些都直接破坏了语言国情学教学法的纯一性,研究者则面临不知“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困惑。此外,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提出“词的搭配是由词汇背景决定”的观点也值得商榷。Прохоров 就认为“这并不妨碍在文本中找出那些按相反方式进行的类似搭配”(同上)。例如,如果说 белая ночь 的搭配是由词汇背景决定的话,那么 Юрьев день (尤里节), Мамаево нашествие (许多令人不快的不速之客的来临)则是由搭配决定意义,孤立的单词与历史事件无关。Прохоров 甚至认为语言国情学企图使语言教学法和方法论达到同一是不现实的(同上, 1998: 17)。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矛盾。在 1983 年版的《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中,他们明确提出基于语言载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的对外俄语教学方法论具有语文学性质(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1983: 49),即“传授(国情文化)要以俄语为中介并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再次对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和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并承认这两门学科的材料与内容(материал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① Прохоров 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失去了从语言到文化的原始逻辑顺序;二是学生不得不长期借助于母语;三是存在程度不同的知识传授不足和过度传授现象。

具有同一性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区别仅仅在于方法论不同。前者运用的是普通国情学方法论, 而后者为语文学方法论。这样就可以“在教学中将国情学素材和所谓的语言国情学方法论结合起来”(同上)。应当指出的是, 方法论和教学法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内容相加就可以做到的。事实上, 直接把国情学素材纳入语言教学过程也决不是“语文学方法论”。

此外, Верещагин 和 Костомаров 对语言国情学教学法的广义理解将使之面临失去界限的危险。语言国情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 只要研究的是语言中表达的民族文化问题, 都可纳入语言国情学的对象范畴。显然这不是一门语言国情学所能承担得了的, 也不符合一门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规律, 因为明确的对象和方法是学科得以确立的基础。

这种学科内部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忧虑和深思。Прохоров 不无道理地指出, 它的出路在于“要么融入语文学中, 要么作为一个对外俄语教学全过程的总括概念在语言学和教学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Прохоров, 1998: 17)。А. И. Моисеев 则将语言国情学视为一门旨在更为全面、深入、自然和自由地掌握语言的教学、科研和方法论学科, 目的是传授对象国语言及其现实制度、生活方式等民族文化内容。他指出, 语言国情学不是语言教学的一个方面, 因为语言在此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 而占据中心地位和体现最终目的是国情知识, 从而指出了语言国情学非语言学本质的一面 (А. И. Моисеев, 1983)。

1983 - 1989 年的语言国情学研究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 一是所谓对比语言国情学问题; 二是篇章的语言国情学研究。前者涉及的是跨文化交际及语言对比问题, 首先探讨的是两种语言对比条件下民族文化语义的特点与差异。接下来的研究依然没有逃脱转向纯国情学研究的怪圈, 从而失掉了其内在的发展的逻辑

性。后者探讨的是语言国情学式的阅读（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е чтение）问题。它也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阅读俄语文本作为手段，目的在于揭示其中的民族文化信息；二是向学生介绍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俄语文本和通过文本传授接受该文本所必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的背景知识（《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1983：135 - 182，1990：110 - 145，186 - 209）。

后一种发展方向可视为语言国情学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的努力和尝试。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努力并不成功。文学文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难以真正做到在教授俄语的同时进行“语言国情学式的阅读”。一方面，文学作品首先是艺术创作，服务于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旨趣，其中有民族文化内容的客观反映，但也有些内容为了实现作家意图与现实生活不相符，以此为依据介绍民族文化特性有时不免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从语言教学角度看，文学文本的语言分析和修辞分析似乎与语言国情学的关系不大。即令是表现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内容方面，也都有人从文学、修辞学、文化学角度作过精彩的阐释，走的也都不是语言国情学的路子（Лютман 1983，Доценко 1986，Сорокин 1998 等等）。出于上述原因，“语言国情学式的阅读”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事实上在 1987 年敖德萨会议之后就停止了。1990 年版的《语言与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对前几版内容的修正和补充。

Прохоров 对截止到 80 年代末的语言国情学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语言国情学的产生和发展对 70 - 80 年代对外俄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外国学生学习俄语的素材发生了质的变化；

2) 语言国情学对体现在语言单位中的民族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了广泛、科学的描写，也为语言教学提供了新类型、新题材的

实践素材;

3) 语言国情学在语言教学的同时传授国情知识,极大扩展了学习俄语的外国人的知识面(Прохоров, 1998: 31-32)。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联酝酿着深刻的政治变革。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语言国情学第一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解决语言国情学出路和发展方向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四、90年代语言国情学的发展

90年代以来,依靠理论思想不断推陈出新,语言国情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一些自身固有的矛盾无法克服,研究者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思索“语言国情学是什么”、“什么才是它的研究对象”、“该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出于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理解,语言国情学朝着两个主要方向向前发展:一是语言学家(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文化学家和语言教学法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有意将语言国情学整合到各自学科下作它们的一个分支,赋予其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文化学和教学法理论与语言国情学作为对外俄语教学一个方面的普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语言国情学最近十年的发展看,围绕上述两大派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五、语言学的语言国情学

早在1984年,Г. Д. Томахин博士就提出,语言国情学应视作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他认为对语言国情学这门学科可以有四种不同理解:一是作为倾向于国情学的语言学(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二是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отрасль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и);三是作为语言教学论的一个部分(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и);四是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Томахин, 1984)。在Томахин看来,语言国情学应当是一门语文学